

·文史新探·

唐代诗人于武陵、于邺诗集考辨*

龙成松

内容摘要:于武陵、于邺为中晚唐时期两个重要的诗人,但宋代以来长期将二人混为一谈;历代艺文志和书目文献所载二人诗集又重出互见,莫衷一是,研究者稍不留意便会落入其诗、其人的双重“陷阱”。突破此难题的一条线索是寻找二人诗集的演变过程及版本渊源,据此判定诗歌的归属。通过对现存明初汇刻唐人诗集中二人诗集版本的对比研究,可以一定程度上恢复二人诗集的原貌。另一条线索是从二人生平资料中寻找其诗歌的印证,从而反推二人重出诗歌的归属,而出土于邺家族人物墓志中的新材料是重要的突破点。

关键词:于武陵 于邺 诗集 版本 墓志

在唐代文学史上,诗人生平事迹相混且诗集又重出互见,于武陵、于邺为重要代表。虽然既有研究早已触及这一问题,但长期以来形成的混乱使得这团“疑云”一直未能被驱散。元代辛文房《唐才子传》谓“(于)武陵,名邺,以字行”;傅璇琮先生主编《唐才子传笺证》,梁超然先生对于武陵传之笺注亦以于武陵、于邺为一人,并合二人诗论其生平^①;孟二冬先生《登科记考补正》亦采梁说,而据以录于邺(于武陵)为中和二年(882)进士^②。陈尚君先生为《唐才子传笺证》“于武陵”条作补证,始考为二人,而以于武陵为大中进士^③;张固也先生在此基础上,否定了大中进士说,进一步对于武陵生平、踪迹、诗歌派别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新出墓志与唐代少数民族裔文学研究”(项目号:17CZW018)阶段性成果。

①傅璇琮主编:《唐才子传笺证》第3册,中华书局,2000年,第424-428页。

②孟二冬:《登科记考补正》,北京燕山出版社,2003年,第987页。

③傅璇琮主编:《唐才子传校笺》第5册,中华书局,2000年,第412-414页。

做了详细的考察,却未对于武陵、于邺诗歌混乱的情况做出辨析^①。陈尚君先生之学生冉旭在《〈唐音统签〉研究》中对二人诗集渊源有辨析,但又将二人视为一人^②,回到了原点。综合诸人之研究成果:于武陵之生平大致可以推定,但于邺之生平却远未触及,至于二人诗集版本之渊源,则更待考索。

新出土文献提供了重要线索。山东淄博拿云博物馆藏唐崔特为其夫人于氏所撰墓志铭^③中,出现了有关于邺的重要信息。此于邺为诗人于邺的可能性极大,同时也勾连了五代后唐时期之另一位于邺,即三个于邺(详下文)或为同一人。根据于邺及其家族之事迹,我们可以重新推定于武陵、于邺诗歌的内容,进一步接近二人诗集的真相。

一、于邺、于武陵诗集的流传及刊刻情况

据陈尚君、张固也两位先生的研究,于武陵为中晚唐人,与贾岛、无可同时,其卒在大中六年(852)前。其诗歌在《诗人主客图》、《又玄集》、《才调集》等唐五代著作中已经选录,宋初《文苑英华》更收录其诗三十首。自《新唐书·艺文志》著录其诗集一卷,此后《万首唐人绝句选》有少量新增,终宋之世,其诗未见大量新出,目录著作之著录亦有序,可见其诗集已定型。于邺,《唐诗纪事》云其为“唐末进士”,其诗唐五代至宋初未见引用,《新唐书·艺文志》虽著录为一卷,但宋代公私目录中,只有《遂初堂书目》、《通志·艺文略》二书同时著录了于武陵、于邺诗集,余皆只著录于武陵诗集,可见于邺诗集尚未定型,或者流传未广。至明代以来,公私书目中,多同时著录于武陵、于邺诗集,这是不同于宋代的重要现象。另外,明人汇刻唐人诗集中开始出现于武陵、于邺诗集之传本,然而已经混乱不堪:或题名歧误,或分合不当,或增删无据,这是今日我们最应排查者。

(一)唐宋元时期

于武陵、于邺诗集虽然《新唐书》中已有著录,但他们诗歌的流传却很复杂。于武陵诗,张为《诗人主客图》最早引用三联:“白日不西落,红尘应亦深”;“青山如有利,白石亦成尘”;“四海少平路,千川无定波”。据后世传本,分别出自《东门路》、《寻山》、《送客东归》三首诗。

在唐人选唐诗中,《又玄集》选于武陵三首:《听歌》、《感怀》、《长信宫》;《才调集》选于武陵诗歌九首:《夜与故人别》、《洛阳道》、《别友人》、《寄北客》、《洛阳晴望》、《东门路》、《长信愁》、《有感》、《劝酒》。

宋代,《文苑英华》收于武陵诗三十首(《赠卖松人》一首重见)。此外,王

①张固也:《中晚唐诗诗人于武陵考》,《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8年第5期,第91-98页。

②冉旭:《〈唐音统签〉研究》,复旦大学2004年古代文学博士学位论文,第72页。

③吴钢主编:《全唐文补遗》第九辑,三秦出版社,2007年,第419-421页。

安石《唐百家诗选》与洪迈《唐人万首绝句》以及不少选本选录过于武陵诗。综合起来,唐宋人所引、所集于武陵诗有四十四首,这些诗相比之下疑点较小,可以视为于武陵诗集的基础。

元代杨士宏《唐音》中新出于武陵诗《长信宫》“一失辇前恩”一首,与“簟凉秋气初”一首(已见《文苑英华》,题名作《长信愁》),共题《长信宫二首》。

于邺诗在宋代还是若隐若现。唐宋人所见于邺诗,《唐诗纪事》有《孤云》、《蝉》两首,但同书又认为《孤云》是于武陵诗;而《蝉》即《文苑英华》中《客中闻早蝉》,为于武陵诗。又宋人谢维新《事类备要》前集卷三“天文门”、祝穆《事文类聚》前集卷三“天道部”皆引《孤云》作于邺诗。可见南宋时于邺、于武陵诗已经混淆。此外,《分门纂类唐歌诗》卷九四引于邺诗有《路旁草》;《老学庵笔记》卷十引于邺诗句“远钟当半夜,明月入千家”,即《褰中即事》。

吴师道在《吴礼部诗话》中引时天彝《唐百家诗选》评语:“李端、于武陵集,钱塘陈氏刊行,才各百馀首,仅是断稿耳。”^①陈尚君先生补证《唐才子传》于武陵条据此认为:“今合《全唐诗》所收于武陵、于邺二人名下诗,去其重复,仅存六十馀首,知亡佚为多。”^②按,时天彝南宋宝祐元年(1253)登进士第,此时于武陵、于邺诗已有相混的情形,他所见“百馀首”于武陵诗,可能是于武陵、于邺二人诗集混在一起的结果。《唐才子传》合二人为一人也是这一背景下的产物。而所谓“钱塘陈氏刊行”本,或正为后来明代人所谓于武陵、于邺诗集“宋本”之渊源。

(二)明代

明清时期是二人诗集最混乱的时期,尤其在汇刻唐人诗集中,这一情况最为严重(详见表1,清代几种附于表中);

表1 明清汇刻唐人诗集中于武陵、于邺诗集

丛书名	编刻者	刊刻时间	于武陵诗	于邺诗	备注
唐十八家诗		明初钞本	无	一卷	
唐五十家集		明正德十四年刻本	无	一卷	南宋陈道人家刻《唐人五十家小集》,江标曾据此景写重刻,其子目与此有异同。

①丁福保辑:《历代诗话续编》,中华书局,1983年,第612页。

②《唐才子传校笺》第5册,第414页。

(续表)

丛书名	编刻者	刊刻时间	于武陵诗	于邺诗	备注
唐百三名家诗		嘉靖刻本	一卷	一卷	存六十家八十五卷。《黄裳收书记》著录,疑即朱警编《唐百家诗》,经赵兴茂先生与上图藏本比对,并非全同。冉旭则认为是《唐百家诗集》的一个旧刻残本。
唐百家诗	朱警	嘉靖十九年刊本	一卷	一卷	有前后刻,前刻存二人诗集,后刻只有于邺诗集。
唐十子诗	王准	嘉靖二十六年刻本	一卷	无	题唐于璞撰。
十家唐诗	毕效钦	万历间增刻本	无	一卷	在初、盛唐十家基础上增刻,沿用旧名。
唐四十四家诗		明钞本	一卷	无	题唐于璞撰。
唐四十七家诗		明钞本	一卷	一卷	于武陵诗题唐于璞撰。
百家唐诗		清初钞本	一卷	无	题唐于璞撰,版心间书“百家唐诗”四字。
中晚唐诗纪	龚贤	康熙半亩园刻本	无	一卷	
唐诗百名家全集	席启寓	康熙四十一年刻本	无	一卷	洞庭席氏琴川书屋刊本。
唐人五十家小集	江标	光绪二十一年刻本	一卷	无	江标灵鹫阁据南宋陈道人本湖南使院景刊。

(注:资料来源于《中国丛书综录》及《中国丛书广录》。)

但这些汇刻唐诗,也是二人诗歌新出最多的地方,尤其是明前期汇刻,值得我们重视。

现在所见最早的于武陵或于邺诗集,为明初抄本《唐十八家诗》中所收于邺诗集一卷。据国家图书馆所藏微缩胶卷,此集收录诗歌四十三首。对比唐宋时期所见于武陵诗,此集“新出”十一首诗:《出门》、《题华山麻处士》、《书怀》、《路旁草》、《书情》、《秋夕闻雁》、《岁暮还家》、《褒中即事》、《春过函谷关》、《还家》、《天南忆故人》。其中《路旁草》、《褒中即事》两篇,宋人已作于邺诗。关于明初抄本《唐十八家诗》,研究认为:

按此书收录漫无标准,编次亦无伦序,看来是随抄随录,非有意识、有计划的编集,故亦未加刊刻;所收以中晚唐小家居多,当系根据抄录

者的需要,而亦有保存资料的价值。类似于此的,尚有明抄《唐四十七家诗》一百三十一卷,《唐四十四家诗》九十八卷,清初抄《唐诗二十家》四十一卷等,辑者均佚其名。^①

尽管如此,这是现在所见最早的于邺诗集,虽然与于武陵诗相混,但十一首“新出”诗属于邺的可能性较大。

与明初抄本于邺诗集关系最为密切、最为接近的一个本子,是明正德十四年(1519)刻本《唐五十家集》中于邺诗集。后者只是最后少了《劝酒》一首,餘诗题名、顺序皆同。此刻藏于重庆图书馆,较少为人注意。按正德十四年刻本《唐五十家集》,渊源于南宋陈道人家刻《唐人五十家小集》。前文曾引时天彝所见钱塘陈氏刻本于武陵诗集,或即此本于邺诗集更早之渊源。又将之与朱警所刻《唐百家诗集》中于邺诗集对比,收录诗歌、题名、排序完全相同。可见诸版本似乎渊源有自。

朱警所刻《唐百家诗集》有前后刻,前刻中收于武陵、于邺诗集各一卷;后刻只存于邺诗集一卷。冉旭归纳出《唐百家诗集》后刻的三大版本类型:(一)可确定是宋本的,共十六种。(二)可以确认为明铜活字本者十七家,另外三种伪集《戴叔伦集》、《杨炯集》和《常建集》,都和明铜活字本有关;还有不分体编次的七家别集和铜活字本颇有渊源。(三)题作“某某诗集”一类,尤其中晚唐小集,于邺诗集即在其中。该类中的诗集,后世皆云多出“宋本”,冉旭通过比勘来源较清楚的席氏《唐诗百名家全集》,认为这些小集应该都有旧本的依据,至于是否确出宋本已无法详知^②。

总之,在明人汇刻(钞)唐人诗集中,于武陵、于邺二人诗集的“宋本”渊源并不清楚。在没有新资料的情况下,我们不妨“暂停”对这种渊源的追溯,认为这些版本是明人自行编刻,或许更通达。毕竟现在所见最早的两个于邺诗集,都与这个明初抄本关系密切。

《唐百家诗集》前刻中于武陵诗集的面貌亦可推知。胡震亨《唐音统签·戊签》卷六三六收于武陵诗一卷。其诗分体排列,在“五言律诗”部分前十八首下注云:“以下十八首出《文苑英华》及赵玄度家藏宋本。”^③赵玄度确实藏有一个于武陵诗集。据赵玄度编《脉望馆书目》“妆”字号下面“集”类(原注:“与上同,后书房东间朝西,红厨。”)“唐人诗集”下著录“旧板《百家唐诗》十四本”^④,其残存子目全见于彭元瑞《天禄琳琅书目后编》卷二十所录朱警《唐百

①钱仲联主编:《中国文学大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97年,第344页。

②冉旭:《〈唐音统签〉研究》,第189-194页。

③胡震亨:《唐音统签》第7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473页。

④林夕主编:《中国著名藏书家书目汇刊·明清卷》第10册,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375-376页。

家诗集》前刻子目^①，于武陵、于邺亦在其中。胡震亨所谓赵玄度家藏宋本，或即赵玄度家藏朱警前刻之于武陵诗集。对比《文苑英华》及《戊笈》于武陵前十八首诗，十首不见于《英华》：《感怀》、《游中梁山》、《宿江口》、《秋夜达萧关》、《斜谷道》、《过百牢关贻舟中者》、《客中览镜》、《长安逢隐者》、《与僧语旧》、《匣中琴》。此为又一“新出”诗，即出自所谓“赵玄度家藏宋本”于武陵诗集。

关于赵玄度家藏之宋本于武陵诗集，尚有一些问题值得注意。

首先，赵玄度“旧板百家唐诗十四本”是残缺的，虽然所存六十二家俱见前刻《唐百家诗》，但并不能就直接说是前刻。《脉望馆书目》中，与“旧板《百家唐诗》十四本”同在“收”字号“唐人诗集”下，还著录“《百家唐诗》三十二本”一目，没有具体子目。朱警后刻的《唐百家诗》，明焦竑《国史经籍志》卷五集类已经著录：“《百家唐诗》一百卷，徐献忠。”^②题名徐献忠，盖朱警后刻以徐氏《唐诗品》冠编首，后人误以为徐编。此后，祁承燾《澹生堂藏书目》亦著录：“《百家唐诗》一百五十卷，三十二册，徐献忠编。”^③清代季振宜《季沧苇藏书目》中有：“《唐百家诗》三十二本，又《百家诗抄》本三十本。”^④这些著录者正好是三十二本（册）。可见《脉望馆书目》著录之“《百家唐诗》三十二本”极有可能就是朱警后刻本。这说明赵玄度家收藏了一个残本的《唐百家诗集》前刻，以及一个全本的朱警后刻本《唐百家诗集》。

其次，“旧板《百家唐诗》十四本”子目最后为《搜玉集》。据《唐百家诗集》前刻子目，并无此集。按《搜玉集》为唐人选唐诗集，为何会混入“旧板《百家唐诗》十四本”中？而且在《脉望馆书目》同号下，本来已著录“《搜玉集》一本”。这个“搜玉集”的条目不太可能是误写入“旧板《百家唐诗》十四本”条下，而是原本如此。那么这个“旧版”或与《唐百家诗集》不同，或者彭元瑞著录之前刻目录就有误。前刻的面貌还有一条线索：《中国丛书广录》“总集类”第8108条著录明刊《唐百三名家集》一种，存六十家八十五卷。按语云：“是刻半页十行，行十八字，白口，四周单边或左右双边。据《黄裳收书记》著录。曾疑即朱警编《唐百家诗》，后经赵兴茂先生与上图藏本比对，并非全同。”^⑤冉旭据此认为：“今知上图所藏正为后刻本，而检此集子目则清塞、尚颜、司马札等皆在内，正和《唐百家诗集》旧刻集目相合，则颇疑其为一旧刻残本。此集

①彭元瑞：《天禄琳琅书目后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801-802页。

②焦竑：《国史经籍志》，王承略、刘心明主编：《二十五史艺文经籍志考补萃编》第二十三卷，清华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651页。

③祁承燾：《澹生堂藏书目》，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646页。

④季振宜：《季沧苇藏书目》，中华书局，1985年，第51页。

⑤阳海清：《中国丛书广录》，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760页。

既题云‘百三家’，则其所收当有超出现存集目以外的。”^①这一“旧刻残本”亦为《唐百家诗》前刻范畴。由此证明，彭元瑞所列前刻子目，并不能据以为就是前刻的定本。可能的情况是：所谓前刻，本来是陆续刻出的，而且有不同的版本，所以目录家据所见著录，就出现不同的子目。而朱警后刻统一勘定，没有这样的问题。这就是定本与“未定本”的差异，符合版刻书的一般规律。既然赵玄度家藏的这个前集为残本，那么《搜玉集》或许就是前刻中补入的。《脉望馆书目》这个现象似乎尚未有人注意到。于武陵诗、于邺诗同时在前刻出现，或也是前刻“未定”状态的一种表现。

此外，赵玄度自己曾收辑过晚唐诗，其家亦刊刻书籍。臧懋循在《答曹能始书》（即曹学佺）中说：

又闻赵玄度所辑中晚唐诗，丈悉抄录于《蜀中续梓诗纪》，不审果否？

便间幸示之。仆两年间亦颇有所蒐罗，向见徐兴公云，建宁杨氏有诸写本，

未尽散失，拟于明岁过贵省访之，兼了荔枝夙愿，亦未知筋力能遂此否。^②

臧懋循所谓“赵玄度所辑中晚唐诗”，不是指赵玄度所藏朱警等汇刻唐人诗集，而是指赵玄度自己搜集整理刊刻者。曹学佺编《蜀中广记》卷一百中收录了《才调集》十卷，注云：“海虞赵玄度有抄本。”^③可见臧懋循信中内容不虚。《脉望馆书目》中“旧板《百家唐诗》十四本”下所附之《搜玉集》，或赵玄度家刻补入者，亦有可能。如此，则胡震亨所见赵玄度家藏宋本于武陵诗集，或为赵玄度家收罗者，亦有可能，而其中“新出”十首诗，或亦赵氏父子收集之功？

总之，无论赵玄度家藏宋本于武陵诗集是否可信，亦不论其与《唐百家诗》之关系，在胡震亨眼中，此所谓宋本已非“完璧”，否则胡氏不至于别据《文苑英华》诸书重辑于武陵诗。据此，“新出”部分归于武陵名下，亦是可疑。

“新出”十首诗不一定为于武陵诗，还有其他旁证：

其一，尽管赵玄度家藏“宋本”于武陵诗集与朱警前刻有密切关系，但朱警在后刻中删去了这个本子。前刻九十八家，后刻一百家，朱警增删的情况如下：后刻删除前刻中许琳、沈云卿、苏瑰、尚颜、于武陵、释清塞、唐求、孟贯、牟融、秦公绪、司马札、无名氏等十二家，增入李百药、杨师道、秦思恭、刘廷芝、卢照邻、骆宾王、沈佺期、张说、张九龄、王维、孟浩然、秦隐君、张籍、李嘉佑等十四家。从朱警删增的子目来看，删的主要是晚唐诗，增的主要是初唐诗，其主要目的是为了取得整个汇编的平衡。朱警或参考了徐献忠“循其所尚，差其品目”^④。于武陵诗的删除，就是服务于整个汇刻，但也说明在朱警眼

①冉旭：《〈唐音统签〉研究》，第188页。

②《臧懋循集》卷四，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145页。

③曹学佺编：《蜀中广记》第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611页。

④国家图书馆藏明钞本《唐百家诗》目录后附“嘉靖庚子之秋华亭朱警识”语。

中,这一版本并非善本。同时删去的牟融集,为明人所造伪集^①,可为旁证。

其二,就算这些所谓宋本确有依据,但南宋以后,于武陵、于邺之诗已相混;元代辛文房《唐才子传》误以于武陵、于邺为一人,则元明以后人题于武陵或者于邺之所谓“宋本”,不可盲从。朱警所谓“杂取宋刻,裒为百家”^②,虽号称有善本依据,但明清所谓宋本或善本多不可靠。在表1所列明人汇刻唐人诗集中,尚有多种收录于武陵、于邺诗集,多系在朱警《唐百家诗集》的基础上分合。明代汇刻唐人诗集中所谓“重刻”“翻刻”“覆刻”“影刻”“仿刻”之“宋本”,其实多为明人自行编辑刊刻的。研究明人翻刻宋本的学者认为:

明代翻刻宋本“照式覆刻、纤悉必遵”似乎仅占少数,随着研究的深入,许多被清藏书家著录为覆(翻)刻本的,其中文字也有不少改动,大概藏书家多注重于版式、行款、讳字等形式上的异同,传世稀缺,而于文字内容较少细究,这最主要的是宋本难求,藏书家目力不及,无法进行比勘。再者,以翻刻形式复制宋本,须延请精工,耗费财力,况且用这种方法,在影写时难免有墨迹渗透透过纸背,对宋本的收藏极为不利。因此,真正以覆(影)刻方法复制宋本的不多,传世更罕。^③

这道出了明人动辄以所据为“宋本”的关键所在。明人所据之宋本,多经改窜,一般藏书家只看形式而较少比勘内容,遂为明人所误。

其三,从两次“新出”诗歌的内在关系而言,也可以发现同出一人的证据。明初抄本中《出门》、《褒中即事》与赵玄度本《斜谷道》、《游中梁山》、《过百牢关贻舟中者》五首诗,很明显是从褒斜道转金牛道入蜀路线上的作品,当为一整体,而《褒中即事》陆游已引为于邺诗。

明代于武陵、于邺诗集的版本尚多,但多源于《唐百家诗集》,不再一一梳理。

(三)清代

清代于武陵、于邺诗集在明人的基础上呈现两种发展方向:其一为合编二人诗歌,代表是龚贤、江标;其二是分编二人诗集,代表是《全唐诗》。

龚贤《晚唐诗纪》中收于邺诗六十一首,据贾二强先生考,此后季振宜编《唐诗》正据其本^④。周亮工《读画录》卷二中载其事迹云:“酷嗜中、晚唐诗,搜罗百馀家,中多人未见本。曾刻廿家于广陵,惜乎无力全梓,至今珍什笥中。

①陶敏、刘再华:《〈全唐诗·牟融集〉证伪》,《文献》1997年第2期,第26-31页。

②国家图书馆藏明钞本《唐百家诗》目录后附“嘉靖庚子之秋华亭朱警识”语。

③杨军:《明代翻刻宋本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第271页。

④贾二强:《〈全唐诗稿本〉采用唐集考略》,黄永年主编:《古代文献研究集林》第3集,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252-280页。

古人慧命所系,半千真中、晚之功臣也。”^①郑振铎先生所藏的四个本子中,于邺诗在第三个本子(丙本)中。对于龚贤之书,他认为:“他的中晚唐诸家诗,校勘是很精审的,收罗是很完备的,确曾经过他的一番整理功夫,所据大都善本。”^②《晚唐诗纪》将明初抄本中新见于邺诗十一首,以及赵玄度宋本于武陵新见十首诗,全部打乱编入于邺诗名下。又增入《下第不胜其忿题路左佛庙》这一首与吴武陵重出之诗,带有明显的重辑色彩。其版本渊源不易考察,或为龚贤自己重编之可能性极大。

光绪二十一年(1895)江标据南宋陈道人书籍铺刻本(俗称“书棚本”)影刻《唐人五十家小集》,其中有于武陵诗一卷,陈尚君先生据此所谓“宋本”否定于邺诗:“今存《于邺诗集》一卷,有明朱警《唐百家诗》、清席启寓《唐诗百名家全集》本,但其中所收诗,大多与影宋书棚本《于武陵诗集》重出。疑《于邺诗集》一卷,为南宋以后人据《于武陵诗集》所改题。今存诗,大多或全部皆应为于武陵作,有可能为于邺所作者,仅上列宋人所引及之数首。”^③江标之书,虽据南宋书棚本“景写重刻”,但据同本影刻之正德十四年《唐五十家集》却题作于邺诗,且收诗不同。江标所得南宋书棚本,可能与时天彝所见钱塘陈氏刊本于武陵诗集一样,都是混淆于武陵、于邺诗集的结果。江标本于武陵诗集包含了除《春过函谷关》一首之外所有正德十四年刻本于邺诗,同时收录了赵玄度家藏宋本于武陵诗集“新出”十首诗。但《宿友生林舍因怀贾区》、《赠买松人》、《友人亭松》、《早春日山居寄城郭知己》在《文苑英华》中已为于武陵诗,江标本反未收录,从这个角度而言,这个所谓“宋本”亦大打折扣,或为江标重辑。

《全唐诗》对于武陵、于邺诗集的分合,基本上延续了胡震亨的思路,即分二人诗集为无争议部分和重出部分。其中于邺诗歌没有争议的部分即明初抄本《唐十八家诗》于邺诗新出之十一首。这比《唐音戊签》中于邺诗集更纯粹,因为后者还将《感情》、《山上树》、《洛中有怀》、《送魏山田处士西游》等唐宋人已视为于武陵之诗作为没有争议的于邺诗。《全唐诗》又将《戊签》于武陵诗中得自赵玄度家藏宋本之十首新出诗放到重出部分。这或是因为龚贤《晚唐诗纪》的缘故。从某种程度来看,《全唐诗》于武陵、于邺诗歌的处理,是最合理的一种。

二、新出诗歌归属的内证

1. 诗集演变及版本渊源

宋元明清时期于武陵、于邺诗歌的争议,就是围绕两次“新出”诗进行的。

①周亮工:《读画录》,西泠印社出版社,2008年,第139页。

②《郑振铎古典文学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246-247页。

③《唐才子传校笺》第5册,第413-414页。

新出诗歌究竟归属何人,是影响二人诗集形态最重要的问题。前文从诗集演进及版本渊源的角度,推论两次“新出”诗歌为于邺诗,即以宋代所见于武陵诗为基点。事实上,在找不到有确切根据的宋本于武陵、于邺诗集之前,最好的宋本就是宋代选本。总而言之,于武陵为中唐诗人,其诗集的编辑流传在晚唐时期已经开始,所以唐人选唐诗中已多见其诗。至宋代,选本、总集中广泛选录其诗,其诗集在目录中亦著录有序,这些都指向其诗集的定型态。而且唐宋时期出现的于武陵诗数量,已接近诗集一卷的容量,大规模的“新出”实不太可能。再看诗人于邺,若其与后唐工部郎中于邺为一人,则其卒在后唐天成三年(928),则其诗集在唐末五代宋初只可能是“现在时”。虽然《新唐书·艺文志》著录了,但宋代目录中于邺诗多阙然,这是于邺集尚未定型,或者其诗集流传不广的表现,也与宋人零星见到于邺诗的现象相符。但于邺诗确实在不断扩大流传,其诗也不断处于“新出”的过程,于是其诗集呈现出一种动态的“扩张”。明人嗜唐诗,尤其在复古主义诗风的影响下,对唐人诗集的“发掘”和保存居功至伟,然而也“伪冒”和“混淆”了不少唐诗,这为研究者所悉知。在于武陵、于邺混淆的问题上,前人已如此,他们只能延续错误。明初为于邺诗新出的关键时期,《唐百家诗集》为发掘于邺诗歌的“先锋”,然而也是于武陵、于邺诗在明代混乱的肇始者。两次“新出”诗歌皆与《唐百家诗集》前刻有关,而分割于二人名下,遂造成后世莫衷一是的结果。但朱警在后刻中“纠正”了自己的认识,只存于邺诗集,又反映了某种“通性之真实”。

2. 生平事迹的线索

诗集演变和版本渊源,是从外围推论新出诗歌为于邺诗。随着史料的新出,现在我们又获得了从二人诗歌内容来验证上述推论的可能,而诗人于邺之生平即为其突破口。据洛阳出土《崔特夫人于氏墓志》:夫人于氏,河南人,于志宁六世孙(当为九世),五代祖于默成,高祖于休烈,曾祖于肃,祖于敖。于敖五子:于球、于珪、于瑰、于涓、于琮。夫人于珪第三女,卒于咸通十二年(871),享年三十二,咸通十三年葬。时“季弟乡贡进士邺,扶侍在洛”。据两《唐书》于志宁、于休烈传,及《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墓志中所提供信息多可考,并且可补史实之阙。墓志关联的于邺家族政治、婚姻、文学活动,笔者已有文论之^①。今取有关于邺家族资料与其诗歌相关部分略述如下。

在晚唐五代有三个于邺。其一是我们所熟知的诗人于邺,其二是后唐时工部郎中于邺,还有一个是新出崔特夫人于氏墓志中所见于珪子于邺。胡震

^①参考笔者《洛阳出崔特夫人于氏墓志笺证》,《碑林集刊》第21辑,三秦出版社,2015年,第73-84页。

亨曾疑诗人于邺与后唐工部郎中于邺之关系^①。今据墓志,可推测三个于邺为同一人。于珪子于邺在咸通十三年已为乡贡进士,正符合《唐诗纪事》所云诗人于邺为唐末进士之说。而于珪家族为一典型的“衣冠户”,中晚唐时期于氏登第者多出其家族。此外,于珪家族在文学、艺术、史学等领域渊源深厚,虽然他们传世文学作品不多,但著录、职官、交游和当时的评论都指向其文学家族的特质,诗人于邺出于这样的家族是极有可能的。

于邺咸通十三年已为乡贡进士,姑记其时年二十,则至后唐天成三年,将近八十,这与后唐工部郎中于邺相符。于邺兄弟如于涛、于兢、于悦,在唐末五代初尚十分活跃。于兢在梁开平二年(908)为相,作为“季弟”之于邺,很有可能到后唐时期依然为官。我们注意到于邺的死,是因为不堪卢文纪之“辱”而忿然自经。结合此时于邺之高龄及其家族因缘,其受辱自经及卢文纪因此被贬,就可以理解了。

两次“新出”诗歌中,有出塞、入蜀两条诗人游历的线路,倘若作于武陵诗,则尚少证据,如果从于邺及其家族的事迹来解释则较为合理。“新出”诗歌中《秋夜达萧关》一首:

扰扰浮(一作游)梁路,人忙月自闲。去年为塞客,今夜宿萧关。辞国几经岁,望乡空见山。不知江叶下,又作布衣还。^②

张固也先生根据萧关周边局势及唐、蕃关系认为此诗为于武陵元和十三年(818)十月作,时唐军短暂收复萧关,于武陵参加了收复战役;但萧关旋即失守,所以于武陵抱着失落的心情返回。此论有待推敲。首先,诗中“辞国几经岁”该如何理解。张固也先生认为“几经岁”是虚语,此次出塞不太长。但从词义及诗意来看,此句显然是感慨出塞时间较长。如此则与于武陵时期萧关短暂收复的情形不符。其次,诗中所叙看不出张固也先生所说参与收复萧关战役的自豪和萧关复陷的失落心情,而更多是一种旅途中的无聊以及功名未成的惆怅。倘诗人于邺为于珪子,则此诗不用局限在元和十三年十月这一节点。于珪子于邺咸通十三年前已为乡贡进士,此诗中云“布衣”,则必作于此前。即史载,大中三年(849)之后,吐蕃退兵,萧关一直为唐控制,于邺以布衣身份出塞入塞,可以有多个时间点。《崔特夫人于氏墓志》云:“姊适韦钩,今陇

①《唐音统签·戊签》卷六三七于邺小传云:“于邺,字里不详,诗一卷。唐宋志同。《纪事》云邺唐末进士,或又云即于武陵。《百家唐诗》有其集。考《文苑英华》、《才调集》,多系于武陵诗。今校除重者,外得十五篇。五代唐明宗时有于邺,除工部郎中。时尚书卢文纪玮业,甚不平。陶铸欲请换曹,其夕,邺醉忿自经死。卢坐贬。不知即邺否?”(胡震亨:《唐音统签》第7册,第478页)

②《全唐诗》卷五九五,中华书局,1980年,第6896页。又《全唐诗》卷七二五,第8315页。

州刺史。”^①此韦钩正为于邺之姊夫，于邺出塞或与此有关。

“新出”诗中另外一次比较清晰的行迹是入蜀。《出门》、《斜谷道》、《褒中即事》、《游中梁山》、《过百牢关贻舟中者》等诗完整地记录了此次路线。关于此次入蜀的原因，梁超然先生认为是于邺（即于武陵）僖宗中和年间入蜀应举；张固也先生认为于武陵此行不是入成都，而是去南浦郡（今重庆万县市）为地方官幕僚，待了一年左右后，他从南浦沿长江顺流而下，过夔州、归州，下三峡，进入荆湘，并远至吴越。笔者认为此说尚有可商榷之处。

首先，前文已论入蜀诸诗为一整体，作于邺诗可能性更大。虽然于邺在蜀中活动的行迹没有诗歌内证，但也不能证明诗人未到蜀中。张固也先生引用《远水》诗“悔作望南浦”，认为诗人是到南浦任地方官幕僚，证据不充分，因为《远水》一诗与上述五首入蜀线路上的诗看不出有任何联系。况且“南浦”本为诗文中常见典故，不一定实指。其次，无论于邺还是于武陵，若要去南浦，另有路线，即所谓天宝荔枝道，而不会迂回褒斜道转金牛道。张固也先生又认为于武陵从南浦沿长江顺流而下，过夔州、归州，下三峡，进入荆湘。从二人所有存诗来看，在进入荆湘之前的那一段都存疑。于武陵《客中》诗有“楚人歌竹枝”一句，或许是张固也先生以为于武陵过夔州三峡的证据，但楚人是一个很广的所指，《竹枝》也并非只有在夔州、三峡才有。刘禹锡《洞庭秋月行》诗“荡桨巴童歌竹枝，连樯估客吹羌笛”之“竹枝”，正是在洞庭湖地区。从唐宋时已比较确定为于武陵诗来看，他确实在洞庭湖有过一段滞留，写了不少诗，但未见写巴蜀地区的诗歌。

相对而言，入蜀的经历与于邺生平更为契合。于邺诗中明说此番入蜀是为“名与利”，一种可能是依附其亲党故人，一种可能是入幕求仕，或者如梁超然先生笺所谓中和年间入蜀应举。广明元年（880）十二月黄巢攻陷长安，僖宗在田令孜神策军的护卫下入蜀，于邺之叔父宰相于琮扈从不及，为黄巢所杀。于邺之兄于颢在乱中入蜀，依田令孜及第^②。据此，于邺与家族入蜀的可能极大。但若于珪子于邺为诗人于邺，则咸通中已为进士，似乎与中和年中入蜀应举之说不妥。倘若诗人于邺《书情》一诗为其中和二年（882）入蜀时所

①笔者《洛阳出崔特夫人于氏墓志笺证》，第71页。

②《唐摭言》卷九“恶得及第”条载：“于颢旧名韬玉，长兴相国兄子，贵主视之如己子，莫不委之家政，往往与于关节。由是众议喧然。广明初，崔厚侍郎榜，贵主力取鼎甲。榜除之夕，为设庭燎，仍为宴具，以候同年展敬。选内人美少者十馀辈，执烛跨乘列于长兴西门。既而将入辨色，有朱衣吏驰报曰：‘胡子郎君未及第。’（胡子，颢小字。）诸炬应声掷之于地。巢寇难后，于川中及第，依栖田令孜矣。或曰，颢及第非令孜力，后依其门耳。”《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656页。

写^①,其云“不知书与剑,十载两无成”,则是蹉跎十年之久。往前推十年,正是咸通十二年(871)。这正与于邺咸通十三年稍前乡贡进士(“书”)的说法相合,也与诗人此前出塞(“剑”)而以布衣之身相合,其时当已三十岁左右。

总之,从于邺之生平和其家族因缘中,可以找到两次“新出”诗歌为于邺的更多可能;相反,若视为于武陵诗,则缺乏足够证据。结合二人诗集之演变及版本之渊源,“新出”诗歌归属于邺的可能最大。至少,在没有发现新的、确切的版本证据及诗人生平资料之前,是这样的。

三、于武陵、于邺的关系推测

于武陵诗中多称自己家乡在“鄠杜”、“杜陵”,当为京兆长安人。河南于氏,本鲜卑万纽于氏族裔,孝文帝改于氏,以河南为望。于谨从宇文泰入关,遂称京兆长安人。《旧唐书》于志宁本传,称其为高陵人。于志宁上高宗书说:“臣居关右,代袭箕裘,周魏以来,基址不坠。行成等新营庄宅,尚少田园,于臣有馀,乞申私让。”^②《新唐书》同传作:“臣家自周、魏来,世居关中,贻业不坠。”^③唐代汉人于氏称京兆长安人者,还有右武侯大将军于伯亿以及太仆少卿、怀德公于知机,但其世系不显。于武陵既为京兆鄠县人,其出河南于氏的可能是极大的。

又据《宝刻类编》卷六“李方授”条下著录《三原县尉于武陵墓志》,小注:“兄延陵撰,大中六年。京兆。”^④可知其墓在京兆。按京兆三原为河南于氏家族祖塋所在,于谨墓即在三原。刘禹锡《为京兆李尹答于襄州第一书》:“阁下以大墓世在三原,而去河南益远,尚系望于数百年之外,于义不安。遂奋然移群从,率先行古,占数为京兆人。”^⑤书中于襄州即于頔,为于寔六世孙。于頔家族“大墓世在三原”已数百年。可见河南于氏家族祖塋的延续性。河南于氏家族,倘若按照房分而言,可从于谨九子来分:寔、翼、义、智、绍、弼、简、礼、广。于邵撰《河南于氏家族谱后序》即以九祖分,只不过各支人物有显隐,有

①《书情》诗云:“负郭有田在,年年长废耕。欲磨秋镜净,恐见白头生。未作一句别,已过千里程。不知书与剑,十载两无成。”(《全唐诗》卷七二五,第8312页)入蜀途中诗《出门》亦云“西南千里程,处处有车声”。据《通典》从长安至汉中,取斜谷道,为九百三十三里,驿路一千二百二十三里。西南千里,正至襄中。此一系列诗,正为途中所作。

②《旧唐书》卷七八,中华书局,1975年,第2699页。

③《新唐书》卷一〇四,中华书局,1975年,第4005页。

④《宝刻类编》卷六,《丛书集成初编》本,中华书局,1985年,第148页。

⑤《刘禹锡集》卷十,中华书局,1990年,第122页。

所合并。从现在所见墓志及传世文献来看,其主体皆归葬京兆而非河南^①。除三原之外,河南于氏葬地还有白鹿原、神和原、毕原、高阳原、龙首原、见子原等,虽有所分化,但皆在京兆。唐代汉人于氏较显著者,如东海于惟谦家族,其旧茔则在洛阳北邙^②。

从上述模糊的证据来看,于武陵与于邺极有可能同出河南于氏,至于是否就是于邺所在之于义、于志宁一系则尚待新的证据。清代有一种调和于武陵和于邺的新说。《全五代诗》于邺小传:“邺,武陵人。唐末进士。唐明宗时,官工部郎中。”^③《[光绪]湖南通志·人物志》据此以于邺为武陵人,《艺文志》又收录《于郎中诗》一卷,谓武陵于邺撰。这种以讹传讹的说法,回到了《唐才子传》以“武陵”为于邺之字的怪圈中,是造成历史上二人难分难解的一个重要原因。

再就诗人于邺之生平而言,其留下的片段资料,只能大致地勾勒其轮廓如下:他为于珪之子,为河南于氏,出自于志宁一系,家族文学积淀深厚;在他所处的时代,其家族在社会、文化领域的影响都非常可观;他与于武陵不是同一个人,后者的活动时间要稍前。进一步猜测:他可能在咸通十三年稍前登第;及第前曾有过一段入塞经历;咸通十三年在洛阳奉养亲人,并无官职,其年于琮贬谪案他或受牵连;广明中黄巢之乱,随家人入蜀;中年以后,曾南游洞庭,或为求仕,或依亲人;入五代他已是晚年,或因家族之力在朝为官;后唐天成三年为工部郎中,因不堪官长卢文纪之难自杀,其卒年在八十岁左右。

【作者简介】龙成松,大连理工大学中文系讲师。研究方向:汉唐文学。

①按河南于氏葬河南的例子如:《于思□墓志》:五代祖周太师燕文公(即于谨),曾祖于孝武,祖于乾□,父于善询。太极元年四月卒洛阳县俯义里私第,权葬洛阳县北邙原(吴钢主编:《全唐文补遗》第五辑,三秦出版社,1998年,第27页)。又《于嘉胤墓志》:高祖于寔,曾祖于象贤,祖于德舆,父于文生,开元廿四年卒洛阳南思顺里之私第,葬洛阳西□五里龙门之平原(赵君平:《邙洛碑志三百种》,中华书局,2004年,第168页)。

②《于贲墓志》、《于季文墓志》(吴钢主编:《全唐文补遗》第三辑,三秦出版社,1996年,第44、165页)。皆为于惟谦家人,所葬祖茔皆在洛阳邙山。参看吴炯炯:《唐中宗朝宰相于惟谦家族世系辑考》,《中华文史论丛》2013年第3期,第175-193页。

③李调元编,何光清点校:《全五代诗》卷九,巴蜀书社,1992年,第210页。